

考入联大中文系

1939年,汪曾祺考入联大中文系。那一年,他19岁。

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改为统考,全国分为贵阳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兰州、桂林等七八个考区,基本上都在西部,因为东部都被日本人占领了,所以无法设置。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,没有考点,他是千里迢迢辗转来昆明应考的,对于自己报考联大中文系的缘由,他后来多次说过:“我到昆明考大学,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,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、朱自清先生,还有沈从文先生。”

西南联大有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师范五个学院,其中,文学院、法学院、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,在昆明城的西北角。文学院有中文系、外文系、历史系和哲学系,中文系每年才招十几个学生,非常难考,汪曾祺能考进联大中文系,说明他功底不错。

当时南开大学没有中文系,所以联大中文系是由北大和清华的中文系合并而成的。系主任由清华和北大轮流坐庄,先是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,后来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,只不过罗常培担任系主任的时间比较长,学生们背后都叫他“罗长官”。1941年秋,“罗长官”生病,由杨振声代理了几个月;1944年,罗常培去美国讲学,便由罗庸代理,直至三校复员北返。

西南联大融合了北大、清华和南开民主、自由、开放的学风,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更是得风气之先,这从教授们的言谈举止上即可略见一斑。系主任罗常培极为爱惜人才,他最喜欢两种学生:一是刻苦治学;二是才华横溢。他曾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,在给 学生开的介绍信上竟如此评价:“该生素具创作夙慧。”无独有偶,王力教授也给过弟子类似的评价,当时一位同学填了一首词,作为“诗法”课的作业交给了王力,王先生的评语极具古文人风:“自是君身有仙骨,剪裁妙处不须论。”汪曾祺晚年谈起这些往事,还犹自感叹不已:“具有‘夙慧’,有‘仙骨’,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,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。”

如果说罗常培、王力两位的评语足以让人吃惊的话,那么汪曾祺的遭遇就更有意思了,他在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中回忆,有一次,教授西洋通史 的皮名举先生给诸位弟子布置了一份作业,要求每人画一张马其顿国的地图。作业发下来一看,汪曾祺哭笑不得,原来皮先生在自己的地图上批了这样两句话:“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,科学价值全无。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大教授们的率直与幽默。

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今年5月16日,汪曾祺逝去整整20年了。

汪曾祺的文字很有特点,有老派文人的情趣,这是许多人喜欢他的原因。汪曾祺出身西南联大,是沈从文、朱自清和闻一多的学生,受老师的影响很深,他曾在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中说:“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,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。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我现在这样的作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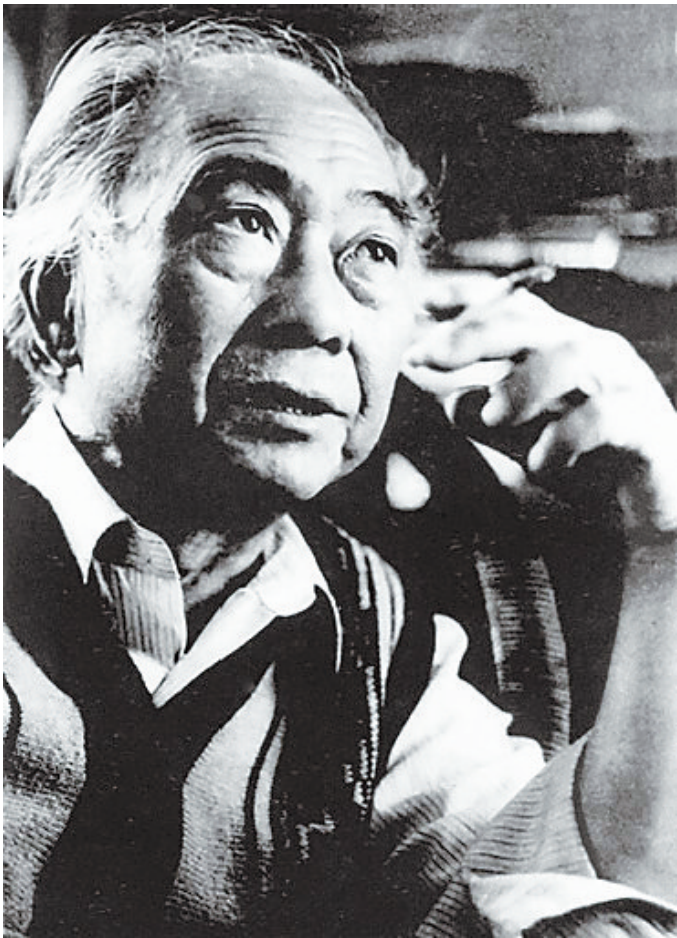
汪曾祺(左)与沈从文



汪曾祺夫妇



西南联大旧址



汪曾祺晚年

闻一多后来接替朱自清当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,他的课非常“叫座”,不仅中文系和文学院的学生爱听,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也来旁听。闻先生上课很有意思,有名士气,先在讲台上点燃烟斗,下面抽烟的同学也点着烟,烟气袅袅,师生同乐,场面非常和谐。

闻一多喜欢有独立看法的学生,汪曾祺颇具“歪才”,文笔也好,所以很获先生激赏。有一次汪曾祺替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的读书报告,闻先生看了非常欣赏,对那位同学说:“你的报告写得很好,比汪曾祺写得还好!”后来汪曾祺回忆说:“其实我写李贺,只写了一点: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,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,故颜色特别浓烈。”

闻一多这篇文章的观点极为新颖,这也是西南联大教授对学生的要求:不怕新,不怕怪,只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。

沈从文的得意弟子

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感情最深,来往也最多,他曾自豪地说:“沈先生很欣赏我,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,可以说是得意高足。”而沈从文也经常向文化界推荐这位学生:“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。”

沈从文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副教授,他在文学院中文系开设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,这几门课汪曾祺都选了。

沈从文年轻时投身行伍,浪迹于湘川黔边一带,没有上过大学,更谈不上留洋了。沈先生学历虽然不高,讲课却是别具一格,他先看学生的作业,然后根据作业中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指导学生。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,其中有许多对话,他

竭力把对话写得有诗意、有哲理一点,不料沈先生却说:“你这不是对话,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。”从此汪曾祺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说的普普通通的话,不要哲理,不要诗意,这样才最真实。

沈从文教学生写作,写的比说的要多,他总是在学生习作后面写读后感,有时比原文还长。除了写读后感,沈先生还给学生推荐一些与习作相近的作品来读。汪曾祺写过一篇《灯下》,描写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,沈先生于是找了几篇类似的作品给他读,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,自己又是怎么写的。这样汪曾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文章的不足,也明白了应该如何下笔。

汪曾祺记忆中的沈从文自奉甚俭,穿衣吃饭都不讲究,他在《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》中回忆说:“他(沈从文)在《湘行散记》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,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。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,夹着一摞书,匆匆忙忙地走。”

汪曾祺常到沈从文在文林街的寓所看他,吃饭时沈先生总是和他去对面小铺吃米线,小铺坐北朝南,桌凳干净,米线味道也清淡,很合沈从文的胃口。两人各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,有时加一个西红柿,打一只鸡蛋,但也不会超过两角五分钱。不过有一次例外,沈先生要了一盘凉鸡,还打了一碗酒,他用碗盖喝了一点点,其余都让汪曾祺喝了。

汪曾祺会做一手好菜,多年以后他和沈从文都住在北京,老师有次顺路来看他,汪曾祺特地做了一只烧羊腿和一条鱼招待。沈从文吃得很尽兴,回家后一再向张兆和说:“真好吃。”

泡茶馆

查阅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一书,我们发现1939年中文系新生名单中有汪曾祺,但后来的毕业生名录里却不见了他的名字——原来汪曾祺并没有拿到联大的毕业证书,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。

汪曾祺有名士习气,许多年后,他的舍友何兆武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:“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,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,叫汪曾祺。他和我同级,年纪差不多,都十八九岁,只能算是小青年,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,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,扣子只扣两个,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,经常说笑话,还抽烟,很颓废的那种样子,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。”

汪曾祺自己也常说,他在西南联大不是个用功的学生,常不上课,但乱七八糟却看了不少书。汪曾祺经常晚上一个人到系里的图书馆看书,在这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阅手续,随便拿随便看,还可以抽烟。中文系在学校的西北角,墙外是一片坟地,非常安静。有一天深夜,汪曾祺在图书馆里听见墙外坟地里传来一派细乐的声音,究竟是怎么回事,他也没有弄明白。

图书馆里座位不多,白天人多没地方坐,于是汪曾祺便去泡茶馆。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的专用语,当地人说坐茶馆,“泡”是北京话,北京来的学生把“泡”字带到了昆明。汪曾祺有一个姓陆的同学,一整天都在茶馆里看书,洗刷用具都放在茶馆,早上起来就到那里洗脸刷牙,泡一碗茶,吃两个烧饼,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时,才挟着厚厚的书回宿舍睡觉。

汪曾祺和外文系的两个同学一起到茶馆看书,茶馆离翠湖很近,从翠湖吹来的风,还带有水浮莲的气味。他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,各看各的书,有时半天都不说一句话。汪曾祺这时刚刚开始写作,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这家茶馆里完成的。

昆明的茶馆其实就是个缩小的社会,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。人们只知道汪曾祺是个了不起的文人,却不知道他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,其实汪曾祺文笔中的许多功夫,都来自当年的泡茶馆,这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:“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,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。”